

#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钟启东

**[摘要]**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开端、阶级本质和意识形态规律。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就是要以之为指导来认识和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历史：现实的个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开端，这个开端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此展开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中，对于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登场，具有最终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定社会时代的物质利益关系，正是围绕这个根本利益进行的生产和分配引起了阶级分化、孕育了阶级思想、导致并激化了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行动中被构建和确立起来，尽管这个过程不乏个人寻求委身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渴望和发展愿望，但只要社会制度还采取阶级统治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始终遵循意识形态生成运行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章编号]** 1002-3054(2023)12-0018-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231202

## 一、引言

描述方法不等于运用方法，这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更是如此，熟练背出基本原理并不代表真正研究了问题。真理之所以是具体的，既是因为真理被把握为观念上的具体，也是因为真理被运用于具体实际，前者是对真理的揭示，后者是对真理的检验。真理既不迷恋也不封闭于纯粹的思维领域，而是面向尘世生活敞开自身，并“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sup>[1]</sup>，力求在

人的实践中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sup>[2]</sup>。作为“此岸世界的真理”，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研究方法，也是叙述方法，致力于改变世界，能将真理用于具体实际，解决问题、形成经验、揭示规律并恰当地叙述事情本身。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指导思想共识已久，人们也在这个“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sup>[3]</sup>指导下不断拓深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追问和原理建

**[收稿日期]** 2023-08-10

**[作者简介]** 钟启东(1985—)，男，四川内江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VSZ00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原创性贡献及学理化研究。

— 18 —

构,并将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实践体系牢牢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地基之上,但是有一个学科基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直接提出和前提回答,即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在自身形成发展历程中蕴涵着怎样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换言之,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方法来揭示和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缘起变化、本质规定?在此意义上,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不过是力求回到原理本身来研究和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历史,揭示其现实开端、阶级本质和意识形态规律,助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深化发展,从世界历史的原则高度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 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开端

思想政治教育从哪里开端?这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前提性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在询问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从哪里开端,另一方面是在询问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理论建构从哪里开端,前者“似乎”是活动开端、行动起点,后者则指向理论开端、逻辑起点。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是“似乎”,不只是因为这里暗含着对这种认识的否定,更是因为是否把活动开端和理论开端根本区别开来,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在开端和前提问题上的本质差异,而这种异质性又是由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截然对立所规定的。因此,为了说明这个开端问题上的理论分歧,并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个人活动本质,有必要先从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对立说起。具体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之中,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历史观同“意识形态家们”形形色色的错误历史观之间的观念对立、开端差异。

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精神要旨,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制定新的世界观”,这是

通过酝酿、提出和完善“新唯物主义”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他和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初衷时所澄明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和阐发具有双重目的,除了要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更重要地是阐发“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sup>[4]</sup>。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新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相比,它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说明构筑其上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不是相反;跟旧唯物主义相比,它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sup>[5]</sup>,避免把人的本质臆想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在现实性上将其理解和把握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构成新唯物主义批判对象的错误观点,前者以鲍威尔、施蒂纳的思辨唯心主义为代表,后者以费尔巴哈的人道唯物主义为代表。二者的共同点既在于他们都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体系的基地”,还在于他们在历史领域都是彻头彻尾地信奉“唯灵论”或者“思辨的创世原则”,都是“各自在神学的领域内彻底地贯彻黑格尔体系”<sup>[6]</sup>,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力求抛弃神学、后者则希望拯救神学。而这又是因为作为其哲学源头和精神原则的黑格尔体系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改装过的“神正论”,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坦陈的那样——“上帝的生活和上帝的知识因而很可以说是一种自己爱自己的游戏”<sup>[7]</sup>。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一切民族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由于它们都持有唯心史观,因而一方面,它们和神学具有完全相同的理论开端和逻辑起点——“上帝实体”“自我意识”“类”“唯一者”等,二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把抽象的开端想象成什么、设置在哪里及它是如何创造历史的。另一方面,二者都认为思想、概念和精神才是决定性的本原,“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

念世界的产物”<sup>[8]</sup>。“批判的思想活动一定会使现存的东西灭亡，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或者认为有他们的孤立的思想活动就已足够，或者希望争得共同的思想。”<sup>[8]</sup>如此一来，假如世界和历史不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是由思想和观念缔造的。这两种认识具有相同的实质，只不过前者是由上帝亲手缔造，后者则是由上帝化身的无数逻辑格斯来贡献智慧和力量，所以全部历史不过是证明自我意识、绝对理念的生成外化史。正如按照思辨的洞见，“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sup>[9]</sup>，因为“当思辨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它指的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观念、精神等等”<sup>[10]</sup>，所以它们直截了当地“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sup>[11]</sup>，并声称只要群众听从它们“寓言的教导”，在观念秩序中超出了旧世界的思想范围，就能超出旧世界的秩序范围，也就能获得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

但是，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达到了顶点的“整个德国思辨的胡说”表示明确反对，而且人民群众也对这种“无内容的空洞”和“思辨的自我循环”丝毫不感兴趣并充满厌烦。这是因为，其一，以这些胡说和臆想为哲学英雄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混淆起来。其二，思辨造成这种混淆的意识形态颠倒，一方面是由于它们虔信其中的唯心主义教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种颠倒连同其唯心主义信仰，是“意识形态家们”所不自知的，正如他们不知道“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sup>[12]</sup>那样，当然他们也就不可能看到，完成了宗教解放的“政治国家”竟然同“基督教国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sup>[13]</sup>。其三，这种对立是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现实分裂造成的，思辨作为“颠倒的世界”既会必然生成又要竭力

掩盖构筑其上的“颠倒的世界意识”“天赋人权”“生而自由”“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理性和公义之名先后出场，导致现实的个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sup>[13]</sup>。其四，这“双重的生活”日益表现为“双重的压迫”，即日益异化成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人们“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sup>[14]</sup>，要想彻底解决“尘世的颠倒”以及构筑其上的“理论的对立”，就必须在现实个人的社会行动中借助“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来推进和完成，从而将之上升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追求和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

综上所述，“思辨的胡说”之所以是“意识形态的颠倒”，正是因为它把“抽象的人”作为自己的理论开端和逻辑起点，尽管它认为自己确实看到了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但是它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现实的人其实已经是被市民社会的颠倒逻辑所显示出来的假象了。于是，颇为吊诡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悖论就这样产生了：从理论构建来看，它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说，都是从“抽象的人”“想象的人性”这个虚构开端出发的，倒金字塔式的意识形态结构似乎不堪一击、一推就倒；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意识形态结构却又是如此的稳定深入，以致于在现代性的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无时不有。这是因为，一旦到了市民社会深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相信“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格言教化，而是借助分工、车间、工资、商品乃至“步兵、炮兵、骑兵”这些现实性力量来建构强加于人们身上的利益分化和本质物化，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影响着现实个人的精神生活和观念图景，普遍导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sup>[15]</sup>。

因此，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似乎在从“抽象的人”这个逻辑开端出发，实际上它的真正秘密和行动开端同样是“现实的个人”及



其物质利益需要。否则，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做到既相信自己编制的意识形态神话，又原谅自己道貌岸然地在世界各处理直气壮地践踏和破灭这些意识形态神话呢？归根到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16]</sup>，这些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sup>[17]</sup>，这些个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把生产生活资料作为第一个历史行动，并随着这种行动的变化深入改变着自己的思想观念，所以“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sup>[18]</sup>。

可见，既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遵从这个规律，无论它被歪曲到何种地步、被美化为何种理想，它在现实性上总是诚实地把具体个人的物质生产行动作为真正开端。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是现实的个人活动，是构筑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及其利益关系之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只不过由于理论开端的差异导致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说假设和体系构建，资产阶级及其辩护者们从“抽象的人”出发走向虚假、伪善和反动。与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则始终立足“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行动，来清算哲学信仰、破解历史之谜、塑造新的世界观，终止了“思辨的胡说”，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确立了“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sup>[19]</sup>，亦即“此岸世界的真理”。

### 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本质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形成发展起来的？既然实质上都把“现实的个人”作为行动起点和实际开端，为何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要采取颠倒的意识形式，把现实的人抽象为“原子”“帽子”“观念”或者“类”，并在自

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彻底颠倒市民社会的真相本质，从而将自己与现实基础的真实联系模糊起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过程中，那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动因，既然不是神的意志，也非思维的强制，那它究竟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开端并不会停留于自身，而是要向前展开并实现潜在于自身的丰富内容。既然“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sup>[20]</sup>，那我们索性就从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成熟形态，是如何从这个现实开端生长出来、又是如何歪曲这个开端的整个过程说起。关于黑格尔说的“开端”，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探讨商品规律时，借用一句神学术语直截了当地予以回应和揭示：“起初是行动。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sup>[21]</sup>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是调侃商品占有者陷入了类似浮士德那样的困难处境——如果不使自己的商品在社会行动中同其他商品发生交换关系，不使自己的商品同一般等价物相对立，那么就不能把商品变现为货币，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就会摔坏“商品占有者”<sup>[22]</sup>。于是，商品占有者来不及多想，就总是已经在围绕 W-G-W 这个买卖逻辑和 G-W-G 这个增殖逻辑奔走忙碌于全世界了。

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到：“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sup>[23]</sup>作为物质关系、物质动因的“商品本性的规律”，能够支配“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人的造物竟然反过来支配人本身，而且这种支配还在“商品占有者”那里表现得自然而然和天经地义。这就说明，人的本质力量在“商品拜物教”中彻底异化了，并且这种异化深刻塑造了市民社会的运行规律和支配人格。资本逻辑力求把所有人都变成金钱的奴隶，就像它把自己想象成“普照的光”那样，它总是渴望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一个世界。那些被资本逻辑牢牢支配的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已经这样做了<sup>[24]</sup>。置身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获

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sup>[25]</sup>，从而每个人都不得不“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sup>[26]</sup>。

既然异化如此严重，那么人们为何没有清醒认识到资本逻辑及其拜物教对现实个人的支配呢？人不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吗，不是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sup>[27]</sup>吗？这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异化成了“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sup>[28]</sup>，流通领域的平等表象掩盖了生产领域的剥削本质。马克思在这里借鉴了黑格尔的洞察方法，把资产阶级社会分成表象世界（现象）和本质世界（现实）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商品交换的流通领域，后者则是商品制造的生产领域。流通领域遵从平等交换的正当法则，人的劳动作为商品被投入市场，看起来也是得到了这个平等法则的充分尊重——卖出劳动、拿回工资，从而掩盖了生产领域中每天都在真实发生的，制造并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秘密。这就导致“生产层面所发生的事实，在流通层面被否认了”<sup>[29]</sup>。在这里，“否认”意味着流通层面对生产层面的“颠倒”，亦即“颠倒的表象世界”对“颠倒的本质世界”的颠倒，它巧妙地采取了“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sup>[30]</sup>，结果是“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sup>[31]</sup>。这个“颠倒的表象世界”不仅“掩盖了现实关系”，而且“显示出它的反面”，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不仅“反映在资本家头脑的意识中”<sup>[32]</sup>，而且成为“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词”<sup>[31]</sup>表现自身形式的现实依据。

如果仅仅从作为表象世界的商品流通领域来看，“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

沁。”<sup>[33]</sup>然而，一旦离开这种表象和抽象，“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sup>[34]</sup>。可见，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异化力量和压迫结构，被流通领域颠倒了，后者作为冒充本质的表象，被抽象地把握为“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等意识形态。不仅把现实的人抽象为“原子”“帽子”“观念”或者“类”，而且用这些抽象观念及其意识形态体系，掩盖了生产领域的普遍奴役及其剥削秘密，使人们没有意识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却已经在这种支配下行动，使人们即使体验到全面异化的生理痛苦和心理痛楚，却找不到真正的苦难之源和仇恨对象，只能对机器、对生产线、对自己和同类生闷气、发脾气。

这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产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支配的秘密，这个秘密不过是说明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即便它是“颠倒的世界”）同时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颠倒的世界意识”），前者对于后者的生成变化具有最终决定性，后者没有独立性，但是对前者具有特殊重要的反作用。这个反作用，既可以是辩护、支撑和推动力量，也可能是反驳、消解和革命力量，甚至会引起一定社会时代的覆灭。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为何种性质和强度的观念意义、现实性力量，在根本上取决于它处于哪个历史阶段、取决于它为哪个阶级服务。说到底，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反映着一定群体、集团、阶级的物质力量和根本利益，因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服务于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统治工具。但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到不可调和、必须诉诸决战的革命时代，在一定普遍性上代表了被压迫阶级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的革命等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揭穿和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支配体系，动员组织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反抗压迫、争得

解放，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既是剥削阶级用来全面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工具，也是革命阶级用来全面反抗奴役的革命武器，前者是为了巩固和延续统治，后者是为了推翻并实现统治，前者是为了确立并教化统治阶级的思想，后者是为了揭穿和取消这个思想统治，从而将自己阶级集团的理论原则和观念体系提升为在社会意识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二者总是存在于阶级斗争之中，只不过是大多数时候看起来比较平静缓和，后者一般来说也多是潜伏在社会意识领域、社会思潮之中，尽可能地采取隐蔽的形式和渗透的策略来建构并传播自身利益原则。直到革命的风暴口彻底到来之前，它才浮出水面“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sup>[35]</sup>，并随着革命阶级推翻了现有统治、赢得政权，而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和支配性的精神力量，“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sup>[36]</sup>。

资产阶级领导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开展民主革命使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下挣脱出来正是如此；只不过它一旦确立起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就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抛弃了，“普遍的人权”变成“普遍的谎言”，所谓“人人平等”不过是“有钱人之间的平等”，所谓“个人自由”不过是“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因为真正自由的从来就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贪婪的资本”。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启蒙的骄傲”变成了“致命的自负”，“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变成了“公开的、无耻的、露骨的剥削”<sup>[37]</sup>，它曾经“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sup>[38]</sup>，这才有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真实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思想原则，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引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主体，真正致力于实现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创了“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理论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时代产物，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历史性出场，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科学，共产主义运动才找到了“真理的青天”和“理想的彼岸”。

#### 四、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规律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而阶级斗争又始终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也贯彻着深刻的国家本质，不是在保卫国家政权，就是在争夺国家政权，总是力求在权力形式上成为国家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

不同于黑格尔从“伦理理念的现实”和“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sup>[39]</sup>来理解国家的本质，把普鲁士国家看成“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sup>[40]</sup>，马克思颠倒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国家观，提出“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sup>[41]</sup>。不仅国家的本质和属性，而且国家采取何种形式、履行哪些职能，都是由“市民社会”决定的。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人类历史，在市民社会领域总是存在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这就使得构筑其上的国家获得了双重的阶级属性——国家既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阶级斗争的原因。

作为“结果”，国家不仅表明它自身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却又不得不把冲突保持在一定“秩序”范围内的社会行动，而且表明它自身“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sup>[42]</sup>。但这“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却真实拥有着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而保证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作为“原因”，



国家掌握着“公共权力”，使统治阶级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而每次阶级斗争都必然要围绕着国家政权及其公共权力的争夺来进行，不管是正在统治的阶级，还是反抗统治的革命阶级，掌握“国家机器”都是他们的阶级理想和斗争原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sup>[43]</sup>这就是说，即便是实现了人民大众对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统治，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在国家的本来意义上开展革命行动和思想建构，这就需要觉悟民众、团结人民、振奋精神，因此必须及时地建构能够集中体现自己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原则、理论体系，亦即坚决反抗并致力于取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可见，无论是国家的阶级本质需要，还是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阶级斗争的国家形式需要，都被归结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需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国家”与“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和人类历史上被同时创造出来。

于是，“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sup>[44]</sup>。这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首先，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和形式，国家一经产生就形成了思想领域的支配关系，就是说“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sup>[45]</sup>，而这“另外的意识形态”是由“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所决定的，也就是要由“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来提供，这个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所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46]</sup>。其次，国家要把“统治阶级的思想”描述并确立为“普遍性的思想”或者说“国家的思想”，使之进一步成为“一个时代

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要由“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sup>[47]</sup>来编造幻想或者揭示真相。最后，无论出于哪种情况，正如国家表明它本身就是阶级对立那样，它同时也表明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力量本身，因为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阶级“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sup>[47]</sup>，也就塑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关系、统治秩序——不仅被统治阶级要服从统治阶级的思想秩序和观念支配，而且统治阶级内部那些“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但又“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的国家成员，也要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服从这个意识形态力量的引导和教化，以便“这一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sup>[47]</sup>，能团结起来保卫自身和国家。

可见，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需要是同一个事情，那就是统治阶级会在一切领域中塑造“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sup>[47]</sup>，也就是全面贯彻自己的统治意志。只不过前者表现为这个事情，对于确立“观念的上层建筑”的辩护渴望，后者则是体现了这个事情对于加强“政治的上层建筑”的权力渴望。国家要实行阶级镇压、开展公共管理，当然需要法的意识、政治的原则、伦理的观念、哲学的理念乃至宗教的信念等意识形态，为之辩护和论证，因而它就会支持意识形态力量的理论活动和教育行动；反过来说，这些“意识形态的诸形式”，不管它们自身多么完善精致、深刻透彻，都不能直接去影响和塑造人的思想生活，不仅要借助“国家的形式”来对自己进行确认和赋能，而且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贯彻和实现自己。

在此情形下，思想政治教育就在阶级斗争历史上被迫切地发明了出来。这个发明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行动被积极地构建和确立起来。之所以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出场做严格的限定，是因为在国家产生之前，原始社会中就逐渐形成了

一些类似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功能的宗教活动和部落教育，它或许有着很高的社会威望和教化成效，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形态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它还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还不是国家统治的权力与工具。只有当阶级斗争激化到一定程度后，思想政治教育才随着国家的产生而被构建和确认起来，并始终围绕国家政权和发挥意识形态力量来展开自身行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如此，革命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层面一经出场，就迅速成为贯穿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等各个领域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环节。这既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现实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而这与国家和意识形态恰好有着相同的性质和前提；更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能有效地总结经验、加工观念、诉诸批判、揭示思想、制造体系，从而可以很好地满足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还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能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国家宣传、社会动员和个体教化，从而可以很好地满足意识形态的国家需要，也就成了国家着手建设并不断强化意识形态支配体系的必然选择。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国家支配个人意识形态力量的集中体现，遵循着意识形态支配个人的基本逻辑。关于这个意识形态力量及其支配逻辑，阿尔都塞曾经力求从“意识形态物质化”的理论维度做出说明：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国家”和“意识形态”是同时存在着的两个“现实”<sup>[48]</sup>，前者是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等“镇压性国家机器”，后者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是“由各种确定的机构、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sup>[49]</sup>，包括教育机器、家庭机器、宗教机器、政治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文化机器等等。“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区别在于，前者直接使用肉体暴力，后者则是“不以占统治地位的和显性可见的方式诉诸肉体

暴力”<sup>[50]</sup>发挥支配功能，但这并不表明意识形态没有国家的强制属性。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如何具体发挥功能这个问题上，阿尔都塞认为答案在于唤问主体的镜像结构，“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每个具体的个人唤问为具体的主体”<sup>[51]</sup>，使个人在承认、臣服于意识形态这个“大主体”的前提下作为“主体的个人(你和我)‘运转起来’”<sup>[52]</sup>。阿尔都塞特别指出，资产阶级就是通过宗教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审美意识形态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无数主体(生产的当事人)唤询出来“使它自动运转起来”，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及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能永世长存<sup>[53]</sup>。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阿尔都塞在把“意识形态物质化”的过程中，过分看重、片面发展意识形态的实体属性和功能结构，因为这不仅模糊了“政治的上层建筑”与“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的本质区别，更是在讨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参与构成的“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基本关系时陷入结构主义错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但是，我们可以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进一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是如何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个体支配的。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镜像唤问机制的理论假设，构成了关于意识形态支配逻辑、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规律的思想探求。这种思想探求的正确之处在于：其一，阿尔都塞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阶级性质，而且指出了每个国家都会运用意识形态来巩固政权、保障生产；其二，阿尔都塞注意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并运用“大主体”与“小主体”的解释结构来表述了前者召唤后者的镜像原理；其三，阿尔都塞没有停留于纯粹精神领域探讨这个镜像召唤机制，而是进入实践领域、生产领域，指出这个召唤机制存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不仅存在于政治、教育、文化、传播等“上层建筑”领域，而且存在于生



产领域，因为“生产的场所”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sup>[54]</sup>。生产领域生产着意识形态。

既然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问题，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的支配，需要国家形式和国家力量作为背书与支撑，也就不言而喻了。问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是如何促成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唤呼和感召的，并使后者作为主体自动运转起来的？秘密同样藏在国家身上，具体来说，就是在国家（阶级斗争）创造出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意识形态支配这个事情本身之上。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表明了，在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生活里，也就是在国家的全部社会生活里，意识形态支配个人的统治需要和个体委身于意识形态的信念渴望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里是颠倒着的存在，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了人民民主的国家生活里，这种“同时存在”才不仅正立着，而且是统一的。

就前者来说，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解放时说过，政治解放既不力求也确实没有消除各种实际的宗教笃诚，政治国家仅仅是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导致人们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对抗中过着“双重的生活”，而这又是因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sup>[13]</sup>。所以，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可以使人同时拥有“宗教徒和公民”双重身份，就像它所构筑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双重特征那样：既有新教伦理，也有资本主义精神，一边是信仰的渴望，一边是财富的欲望，半是圣歌的回音，半是枪炮的恫吓，结局是抽象的痛苦伴随着抽象的活动。

就后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sup>[55]</sup>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意识形态力量和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他们要改变这种力量和教育性质：一方面，如果从终极意义上看，那就是要改变其阶级属性，使其在未来

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为任何统治阶级服务，而要实现这个改造的前提就在于，世界历史已经消除了阶级压迫、废除了阶级国家；另一方面，在这个终极理想实现之前，必然存在着一个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社会形态，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改变意识形态力量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只能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内部来探讨，对于阶级敌人则必须“保留原案”。

具体来说，在已经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国家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强基固本、凝心聚力和人民通过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安身立命、全面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所以意识形态在这里就不再表现为“颠倒”而是“实证的科学”，正如思想政治教育在这里不再表现为“统治”而是“发展”那样。如果说这里还存在发生“颠倒”和进行“统治”的现实必要，那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民范畴以外的剥削阶级、敌对势力来说的。客观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着人民和敌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毕竟无产阶级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存在，不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正如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实现也将是世界历史事件那样。

在这之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颠倒”进行“颠倒”，揭穿它的本原真相及构筑其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还要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统治，并将这种“颠倒”和“统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告诉人民。因为在这个发生过渡的历史阶段，即便是最理想的状态——社会主义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挣脱了出来，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后者的影响和痕迹，但最现实的状态则是当今世界依然处于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基本对立之中。所以，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取消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毕竟历史已经留下了资产阶级一度卷土重来的复辟悲剧和意识形态惊悚，何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资本

主义世界，越是内乱和衰退，它们就越能体会到“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56]</sup>的不安和恐惧，它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仇视和意识形态进攻，就会愈加频繁和恶劣。

##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不管那些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学说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将人抽象成什么、将现实歪曲到何种程度，“现实的个人”始终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开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这个实际开端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在由此展开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中，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正是围绕着后者进行的在现实性上存在普遍不公的生

产和分配活动，引起了阶级分化、孕育了阶级思想、导致并激化了阶级斗争，在使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行动在历史中正式登场。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持续推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发生重大转变，并在这种重大转变中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培育人民信仰、增强民族希望、促进世界团结，不断引领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在坚持和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 参考文献：

- [ 1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331.
- [ 2 ] 同[1], 第 500 页。
- [ 3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295.
- [ 4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593.
- [ 5 ] 同[1], 第 499 页。
- [ 6 ] 同[1], 第 342 页。
- [ 7 ] (德)黑格尔著, 贺麟、王玖兴译. 精神现象学(上卷)[M]. 商务印书馆, 1979: 13.
- [ 8 ] 同[1], 第 510 页。
- [ 9 ] 同[1], 第 207 页。
- [ 10 ] 同[1], 第 265 页。
- [ 11 ] 同[1], 第 359 页。
- [ 12 ] 同[1], 第 32 页。
- [ 13 ] 同[1], 第 30 页。
- [ 14 ] 同[1], 第 288 页。
- [ 15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59.
- [ 16 ] 同[1], 第 519 页。
- [ 17 ] 同[1], 第 524 页。
- [ 18 ] 同[1], 第 286 页。
- [ 19 ] 同[1], 第 526 页。
- [ 20 ] 同[17], 第 29 页。
- [ 21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105.
- [ 22 ] 同[21], 第 127 页。
- [ 23 ] 同[21], 第 105 页。
- [ 24 ] 同[21], 第 91 页。
- [ 25 ] 同[1], 第 223 页。
- [ 26 ] 同[1], 第 224 页。
- [ 27 ] 同[1], 第 162 页。
- [ 28 ] 同[23], 第 91 页。
- [ 29 ] (英)乔治·拉雷恩著, 张秀琴译. 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38.
- [ 30 ] 同[21], 第 93 页。
- [ 31 ] 同[21], 第 619 页。
- [ 32 ] 同[21], 第 360 页。
- [ 33 ] 同[21], 第 204 页。
- [ 34 ] 同[21], 第 205 页。

- [35] 同[7], 第 7-8 页。  
[36] 同[7], 第 8 页。  
[37] 同[4], 第 34 页。  
[38] 同[4], 第 37 页。  
[39] (德)黑格尔著, 范扬、张企泰译. 法哲学原理 [M], 商务印书馆, 1961: 289.  
[40] 同[39], 第 294 页。  
[41] 同[4], 第 591 页。  
[42] 同[1], 第 536 页。  
[43] 同[1], 第 536-537 页。  
[44] 同[3], 第 307 页。  
[45] 同[3], 第 308 页。  
[46] 同[1], 第 550 页。  
[47] 同[1], 第 551 页。  
[48] [法]路易·阿尔都塞著, 吴子枫译. 论再生产 [M].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105.  
[49] 同[48], 第 114 页。  
[50] 同[48], 第 179 页。  
[51] 同[48], 第 368 页。  
[52] 同[48], 第 383 页。  
[53] 同[48], 第 388 页。  
[54] 同[48], 第 117 页。  
[55] 同[4], 第 49 页。  
[56] 同[21], 第 874 页。

##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ONG Qi-dong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veals the realistic beginning, class nature, and ideological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o use it as a guide to understand and expres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al individual is the actual begin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first historical activity of this beginning is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life itself. Among the various relationships formed by the unfolding social life, the relationship of material interests in a certain social era plays a final decisive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 as the first ideological power to dominate people and the emerg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state power. It is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round this fundamental interest that causes class differentiation, breeds class ideas, leads to and intensifies class struggle, and is constructed and established in ideological actions. Although this process does not lack individuals' desire for belief and development in seeking to commit themselves to a certain ideology, as long as the social system still takes the form of class ru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st always follow the general laws of the generation and operation of ideology.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y; Marx

【编辑：珈 盈】